

# 劉蘭芳：弘揚岳飛精神 期待評書復興



1986年春節，劉蘭芳在前線炮兵陣地慰問部隊官兵。

## 《岳飛傳》成就評書藝術輝煌

劉蘭芳從小成長在藝人家庭，12歲時就開始學唱東北大鼓，16歲被鞍山市曲藝團發現，後拜孫惠文、趙玉峰等著名藝人為師。

文革後期，評書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沉寂後開始復甦，在大多舊書被付之一炬的困境下，劉蘭芳與丈夫王印權在圖書館的廢墟中找到錢彩原著《岳飛傳》，在此基礎上進行改編。劉蘭芳每天早上錄音、下午演出、晚上繼續整理編寫，歷時一年終於成就經典。

1979年，《岳飛傳》在全國100餘家電台播出，轟動全國，出版後發行100多萬冊。劉蘭芳更走遍全國，演

「精忠報國是我一生的目標。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「六一」國際兒童節看望少年兒童時談及岳飛對自己的影響時說。同樣受到岳飛的巨大影響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文聯副主席、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劉蘭芳在上世紀80年代因評書《岳飛傳》一炮而紅。從藝56年，她述說着岳飛故事也弘揚着岳飛精神。從當年萬人空巷聽說書的盛況，到如今評書藝術日漸衰落的現狀，劉蘭芳認為有其原因所在，但更要從人才建設和宣傳扶持等方面復興這門傳統藝術，而這也是她和弟子們的心願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、實習記者 馬玉潔



出達2800多場。「《岳飛傳》火的時候人山人海，央視紀實節目《見證》中說，當時五毛錢一張票，劉蘭芳說《岳飛傳》門票收入竟有十萬塊錢。」她的徒弟張金山如此形容當時的盛況。

「評書藝術家被國家元首接見的就只有她一個人。」在張金山看來，劉蘭芳作為一個說書人的成就是難以複製的。

## 傳統評書面臨巨大挑戰

改革開放以來，外來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形式如潮水般湧入，評書等傳統藝術面臨的挑戰與日俱增。劉蘭芳認為，這首先是時代進步的表現。「當年說《岳飛傳》萬人空巷，全國一百家電台都播我一個人的評書，那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受到了歡迎。過去沒有文化的人多，就從說書、唱戲學習知識，現在不同了。」

相較於京劇、相聲等其他傳統藝術，評書的地位似乎更顯尷尬。京劇享有國家的扶持政策，相聲小劇場從郭德綱成名之後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。「北京起碼有上千位是說相聲的，有多少是說書的？屈指可數。」張金山表示。

而嚴格的藝術門檻也成為阻礙年輕人從事評書藝術的重要原因。「生旦淨末丑都是一個人演，古今中外、短打袍帶、公案言情、神鬼狐怪兼容並蓄，一個人『演』一台戲，中國的說書藝術在世界上都是獨樹一幟的。」張金山指出，表演的高要求使得對說書人的培養要花費更長時間，「相聲三年出徒，說書得五年出徒，兩年胳膊三年腿，十年練不成一張嘴，這就是說書。」

## 觀眾斷層與平台危機

據劉蘭芳介紹，現在全國有500多家電台播送評書節目，但收聽率差強人意。一方面，收聽習慣發生變化，大部分觀眾只在開車時偶然收聽；另一方面，固定觀眾

的年齡層基本停留在50歲以上，缺乏年輕人的關注。她感慨地說：「如果年輕人上不上來，年輕觀眾都不喜歡這門藝術了，這門藝術就面臨着被淘汰的命運，這是評書最大的危機。」曾興盛一時的電視評書也退出了熒屏，這使劉蘭芳在內的老藝術家們倍感痛心。

在許多評書藝人看來，除了大眾傳媒，真正的說書藝術應有專門的現場舞台表現。「很長一段時間大家習慣開車打開收音機聽，卻忘記了評書也是很強調現場的一門藝術。」張金山表示，希望有一個專門為評書搭建的平台來推廣這門藝術，吸納年輕藝術家，但目前來看條件並不成熟。

## 「要學會兩條腿走路」

劉蘭芳自己始終沒踏入文化市場，卻對弟子們簽約文化公司、接商演表示支持。她在教導弟子們不要太過看重金錢的同時，也認為這一門藝術應當走向市場，適應大環境。劉蘭芳時常會表露出對後輩藝人的擔心，「你要學會兩條腿走路，別單憑說書。」她常常這樣對弟子們說。

劉蘭芳認為，評書重新佔領舞台面臨考驗，首先需要高素質、高文化的說書人寫、說新書，創造新的好的書目，「有新書講話就出奇，觀眾就覺得耳目一新。」同時也需要國家多支持，她希望說書人將來能有更好的就業環境。

## 評書藝術不應消亡

如今，身兼數職的劉蘭芳更時刻關注着國計民生，在履行政協委員的職責外，也經常參與文聯采風、送戲下鄉等活動。她認為，「中國的說書藝術在任何情況下、任何時代也不會被任何一門藝術所代替，在所有的傳統藝術形式中，只有說書的被尊為先生，『談古論今預興



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文聯副主席、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劉蘭芳

邦之大計，褒忠貶奸頌禮儀之先賢。」自古就有『高台教化』的美譽，這麼好的一門藝術不應該消亡，而要很好地傳承下去。」

「過去老先生們輝煌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我們趕上了一個尾巴，現在各種文藝形式競爭激烈，說書一個人表演，即便是藝術、技術含量再高也顯得單薄，也因此越來越被邊緣化，我感覺到壓力很大，任務很重。」張金山說。

## 弟子張金山：二十年師徒情

作為劉蘭芳最得意的弟子，張金山回憶說，自己當年走上評書表演之路只是因為喜歡聽劉蘭芳講的《岳飛傳》，「17歲背着書包就上鞍山拜師了」。在第一次跟劉蘭芳匆匆見面時，他收到一套《岳飛傳》，「劉老師對我說，你把這部書吃透了，看明白了，你就會說書了。」後來劉蘭芳調到北京，張金山又追到北京，終於有一天他得到了肯定的答覆。自此，他跟着師傅一步一步學藝了二十多年。

在培養弟子專業能力的同時，劉蘭芳更希望他們發展出自己的風格。張金山說：「我們24個師兄弟裡面，師傅下功夫最大的、教的時間最長的是我，最像她的也是我。但她還有一個要求，正如齊白石先生所言：『學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』，可以像，但一定要有自己東西，不能完全模仿。」



劉蘭芳與弟子張金山



1987年，劉蘭芳在山東惠民胡集書會。

# 朱良為治「堵」開「良心藥方」



北京市政協委員、北京市政協科技委員會委員朱良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訊（記者 王曉雪 實習記者 聶晨靜、馬玉潔）道路「堵」、空氣「毒」，首都成為「首堵」，呼吸成為困擾，北京正陷入邁向國際大都市途中無法克服的困境。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、北京市政協科技委員會委員，朱良曾多次參加交通方面的調研和座談，提交了關於電子標籤、組團搖號等提案，積極為北京市政府治堵、治霧霾建言獻策。

## 「誰添堵，就管誰」

2010年底，為抑制機動車數量無序暴漲、緩解交通擁堵，北京市政府出台小客車搖號限購政策。作為市

政協委員，朱良受邀現場觀摩了第一場搖號，他當時就認為搖號限購政策是必要的，但也是過渡性的，不能長期持續。

朱良分析，按每年淨增長24萬輛的速度，到2016年北京市機動車將突破600萬輛，2020年將達700萬輛，不出十年就會達到無法承受的飽和數量。屆時無論是凍結新牌照的發放，還是設法擠出存量，都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。

而對於尾號限行政策，朱良也指出這種管理方式流於粗放，並不能真正有效精確控制交通流量，反而給市民正常出行造成不少困擾。他認為，每個人的出行需求不一樣，每個人的「添堵」程度也不同。尾號限行政策是政府替百姓做主，規定哪天能用車哪天不能用。

朱良用兩個生動比喻概括當前北京道路交通管理政策所陷入的困境：搖號限購政策是「光去卡源頭而不是去堵堤防的漏洞。覺得下游可能有洪水，就把上游掐死，可是把上游全掐死了，中游大量需要用水的地方就受池魚之殃了。」而尾號限行政策是「一刀切，少數人生病，所有人都跟着吃藥」。

因此，在朱良看來，面對首都人口和經濟不斷增長的巨大壓力，粗放的交通管理方式已無以為繼，急需轉變思路：「誰添堵，你就去管誰。沒添堵，你去管人家做什麼。」

## 精細管理：「電子標籤」是出路

作為科技界委員，朱良一直倡導交通必須依靠科技手段實行更精細化管理，為此他連續三年在北京市兩會期間提交關於推行機動車「電子標籤」的提案。

「電子標籤」就是在機動車上安裝無線信標裝置，通過無線電信號將車輛的位置信息實時傳遞給交通管理系統。實行電子車牌對車輛實現米秒水平的精確實時定位後，可以對每一條道路的每一個時段進行精細

化管理。至於如何通過電子標籤實現交管部門對車主的用車管理，朱良還從政策層面進行了操作上的設計：每月給每輛車一定的「添堵」額度，類似早年的「糧票」，車主需要在高峰期通過擁堵路段，就通過電子系統繳納「糧票」，額度用完就不能再「添堵」，或者繳納額外的擁堵費，相當於「糧票」用完了買「高價糧」。

朱良介紹，「電子標籤」可以使車主自主安排出行，滿足自己的剛性需求，而不是被動地受政府限制，同時又促使車主節制用車，達到有效限制交通總量的效果。

## 政府回應：北京已列入試點

在朱良看來，「電子標籤」的障礙不是技術問題，現有的衛星GPS導航、ETC卡等電子系統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技術手段。

車主隱私問題，才是提案能否落實的關鍵，但朱良認為這並不是無法克服的障礙。隨着社會發展，現代人群高度密集，傳統的隱私觀念本身就存在主客觀兩個方面受到衝擊，個人部分隱私權的讓渡是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。「只要車輛的運行軌跡不被洩露和非法利用，公眾還是可以接受的。」

據朱良透露，公安部已決定在全國統一啟用電子車牌，北京市已被列入試點。他也坦承，提案是在進一步落實，但問題也在進一步顯現，進行頂層設計時，還需要把這一政策附帶的副作用降至最低。

## 政協的意義：一座橋樑

「實際上我是搭了個橋，所有的技術都是現成的，我只不過組裝了一下，然後利用政協這個平台，往政府和社會的關注點引了一下。」談到「電子標籤」的提案靈感時，朱良說。

而這也正是朱良認為的政協意義之所在——在老百姓和政府之間搭橋。他解釋說，政協不是靠自己發明什麼，而是把社會各界好的思路以及各種需求跟政府做一個對接。把社會需求經過政協委員加工之後，翻譯成政府語言，更好地講給政府聽。

## 委員不能有「病人家屬思維」

擁堵和霧霾成為近年來的熱點話題，民眾對政府有關部門的提醒、指責更是不絕於耳。

朱良把民眾的這種行為及思維方式比喻為「病人家屬思維」：「大家比較習慣於拋問題給政府，但怎麼治政府自己想辦法。這有點像病人家屬的思維：我把病人送到醫院，醫院你給我治。」

而在他看來，政協委員與普通民眾的區別，最關鍵就在於肩負着提醒政府怎麼做的職責。「相當於幫助政府制定一個手術方案，如果政府覺得可行，就照着這個方案來操刀。」



朱良給大學生講提案。

聶晨靜攝